李大钊小传

李大钊,字守常,曾用名李耆年、李钊、李龟年,亦曾字寿昌,笔名明明、常、孤松、猎夫等,在前苏联期间化名琴华。1889 年 10 月 29 日生于直隶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他是遗腹子,出生不久母亲亦去世,靠年已 60 多岁的祖父抚养成人。老人名叫李如珍,考取过秀才,有'从九品'的官衔,又曾在东北经营杂货铺,家中有土地 90 余亩,房屋 20 多间。

李大钊 3 岁起学识字,6 岁入私塾。此后近 10 年间主要诵读'四书'、'五经',间读历史,以备参加科举考试。由于祖父年迈,他尚不满 11 岁时,便与本村年长于自己近 6 岁的赵纫兰结婚。夫妻俩先后生有 9 个儿女,其中 4 个夭折。妻子在他读书期间,操持家务、照顾老人,又在祖父去世家境萧条之时,典当家物,为他筹措学费,使他在饱尝失亲痛苦之余,从贤慧妻子的鼓励中得到温暖和动力,并且由此认识了女性在家庭生活和男女两性和谐的关系中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位置。

1905 年清政府取消了科举制度。同年参加了府试的李大钊转入永平府中学,开始接触英文、数学、外国地理和历史、格致学、外国浅显政治学等近现代教育所属科目。这一时期,拒俄运动刚刚遭到清政府的镇压不久,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间已经兴起民主革命思想潮流,同盟会亦与同年成立,清政府也已派出大臣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出国考察宪政，并宣布预备立宪。随着年龄增长和视野的开阔,李大钊开始关心国事。他阅读到康有为、梁启超的著作,并结识了他仰慕的谭嗣同,具有强烈爱国心,后来为防备俄国侵略,协助清廷官员交涉中俄边界被俄人杀害的侠士蒋卫平，均受到他们的影响。

1907 年 7 月，尚未完成中学学业的李大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怀着‘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国家之良策’的愿望,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在这所由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委托刚刚创立的全国第一所正式的法政专门学校中，李大钊度过 6 年时光,先后学习了政治学、法学、外国贸易、商业、财政、经济学、社会学等课程,以及英语和日语,为他奠定了厚实的现代社会科学知识基础。在这里,他开始使用‘钊’的名字,后又用寿昌的谐音改字守常,勉励自己发愤学习,坚持不懈,并以古代侠士荆轲、高渐离为榜样,将其所居斋楼取名为‘筑声剑影楼’。他又积极参与了支持立宪派国会请愿运动的罢课活动，被推为学生代表之一。到 1912 年,学校中成立北洋法政学会,他参与其间,担任编辑部长。他在该会的《言治》月刊上先后发表《大哀篇》、《隐忧篇》、《裁都督横议》、《论民权之旁落》等文章、诗作 30 余篇,对民初党争、国家分裂、兵匪遍地、人民涂炭等现象表现出极大忧虑；提出加强党德、废督、进行国民教育、实现统一民主等政治主张。在这一时期,他还接触到明末爱国之士朱舜水的事迹,感受到辛亥革命滦州起义志士，北洋法政学校地理教师白毓昆“为我主义而死”的英雄节操,目睹过被日本兵残杀的中国铁路警察的遗体,读到过日本人中岛端所作的《支那分割之运命》一书。他的民族自尊心受到连续刺激,爱国之情为之高涨。同学对他的评价是‘学之充,文之

豪放,感慨淋漓,明可薄霄汉,幽可泣鬼神”;发为感慨悲歌之篇，其造意树义，一以民生为念，阐扬先哲贻德为急”。

1913 年 5 月，李大钊从北洋法政学校毕业。7 月，在北京通过办《言治》月刊时结识的孙洪伊介绍，认识了汤化龙。孙、汤都是清末立宪派领袖，民初倾向拥护袁世凯的进步党要人、众议院议员。李大钊与他们的结识及其后的交往使他有条件接触和了解民国政治高层内幕，但他却仍感学识不足，在汤化龙资助下，于同年冬东渡日本求学。到东京不久,因投稿《甲寅》,得到该刊主编，著名报人章士钊的器重，结为友好。又通过章士钊和《甲寅》的关系,得以日后结识陈独秀、高一涵等。

同年 9 月，李大钊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共学习 3 个学期，听过国家学原理、帝国宪法、经济学原理、近代政治史等十几门课程。其间接触过早稻田大学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大山郁夫、安部矶雄等人，特别是安部矶雄教授的带有基督教宗教色彩的社会主义思想对他影响较大。同时，他还接触到法国学者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和美国学者爱默生的带有把握今日内容和乐观主义色彩的哲学。在此期间，他还十分留意国内政治局势，参加过留学生反对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斗争,担任斗争组织——留日学生总会的文牍干事、编辑主任,编辑国耻纪念录、《民彝》杂志,撰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国民之薪胆》、《民彝与政治》等文。此外，他还参与发起了爱国组织神州学会，加入了在留学生中成立的中国经济财政学会。1915 年 12 月，护国战争爆发。次年 1 月，李大钊为讨袁事回上海小住两周。2 月 2 日，早稻田大学以长期

缺席为由，将李大钊开除学籍。

1916 年 5 月，李大钊回到上海。不久，应汤化龙之邀抵北京主编《晨钟》报。但因孙、汤矛盾及自己的政见与汤化龙不合，辞去该职。随即与高一涵等筹办《宪法公言》。次年 1 月,应章士钊之邀,担任《甲寅》日刊编辑，并先后在该刊发表了 60 余篇文章。又与天津北洋法政学校毕业的同学筹办《言治》季刊，在该刊发表《战争与人口》等文字。7 月，因张勋率“辫子兵”入京，拥立废帝溥仪复辟，李大钊避走上海。在那里，他发表《辟伪调和》、《暴力与政治》等文,批驳梁启超、汤化龙等人的观点及其依附段祺瑞的行为。

1918 年 1月、经章士钊介绍，李大钊入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在这里工作的近 5 年里，他对图书馆进行了整顿、扩充和改革，并参与了大量校务及社会活动，如担任进德会纠察员，参与发起公余法文夜校、学余俱乐部、教职员会、赈灾社、新知书社,太平洋问题研究会、俄国灾荒赈济会、非宗教大同盟等，还曾代理过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领导索薪和争取教育经费的斗争。此外，他还参与发起少年中国学会，担任过国民裁兵运动大会讲演员、北京学生读书会的导师，指导过天津学生团体觉悟社，参与发起北京工读互助团等。在此期间，他还为青年毛泽东安排了北大图书馆管理员工作，介绍其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并同其商议组织赴俄勤工俭学事宜。

1920 年 7 月，北京大学最高校务决策机构评议会决定将图书馆主任改为教授。此后，李大钊先后任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历史学系教授，在北京大学史学系、政治系、经济系，以及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北京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陆续开设社会主义史、社

会立法、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和现代普选运动、各国的妇女参政运动、工人的国际运动、印度问题、人种问题、社会学等讲座。在此前后，李大钊曾兼任北京大学图书委员会委员、学生自治委员、学生事业管理委员会委员长、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委员，并连续当选为学校评议会评议员。1922 年 12 月，他辞去图书馆主任职，兼任北京大学校长室秘书。

1920 年 4、5 月间，李大钊经北京大学俄文系教授鲍立维介绍，在北京会见了受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派遣的维经斯基一行，随即介绍其赴上海与陈独秀会晤。陈独秀遂于同年 6 月在上海发起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10 月，李大钊同张国焘、张申府在北京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后将其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担任支部书记。不久又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大钊亦为其中成员。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李大钊参加了第三、第四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和第三、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中共二大和三大上，他被任命为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在中共四大上他被任命为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中共北京区委、北方区委配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出版了《劳动者》和《工人周刊》，在长辛店铁路工人中间开办了补习夜校、工人俱乐部，创建了京汉、京奉、正太、津浦铁路，以及开滦五矿、唐山等处工会，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并陆续在天津、河北、吉林、山西、察哈尔、热河、绥远等地区建立了共产党组织。

1922 年 5 月，李大钊与胡适、蔡元培等联名发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了倡议以成立“好政府”作为政治改革手段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同一时期，他还利用朋友白坚武的关系几次与吴佩孚会面，争取他对劳工运动的支持。中共二大提出民主革命纲领和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策略后，他参加了在杭州举行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协助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说服陈独秀、张国焘等同意中共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的方式。随后，他与陈独秀等中共主要领导人相继加入国民党，并应孙中山之命参与了改组国民党的工作。

1924 年 1 月，李大钊赴广州参加了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 5 名成员之一和宣言审查、章程审查、宣传审查三个委员会的成员，并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他代表共产党员就有人提议将“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写入党章一事进行了驳斥。在随后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上，他被任命为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组织部长。

同年 6 月，李大钊作为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赴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后留苏进行参观访问。

1924 年 11 月，由于国内发生冯玉祥倒戈推翻直系军阀的北京政变，李大钊奉命回国，在北京参与领导了迎接孙中山北上和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次年 2 月被孙中山指认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孙中山逝世后，他参与了治丧工作，并团结国民党左派，与右派分子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斗争。同一时期，他先后几次赴张家口、郑州，同国民军首领冯玉祥、胡景翼等会谈，建议在其部队内开展政治工作，推动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

1926 年 1 月，李大钊被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

会选举为中央执行委员。3 月 18 日,他参加了北京市总工会等 200 余团体举行的要求驳斥日、英等八国为大沽口国民军与日本军舰互相炮击而发通牒的国民大会，担任了大会主席之一，会后参加了游行。游行队伍遭到段祺瑞政府的镇压，造成三·一八惨案。随后，受到通缉的李大钊等将国共两党领导机关搬进北京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内的旧兵营。在这里，李大钊继续同已到苏联的冯玉祥和国内的阎锡山联系，终于促成冯回国领导国民军在五原誓师，响应了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

1927 年 4 月 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军警 300 多人包围了俄国使馆，将李大钊等 60 余人逮捕，随即进行了审问。李大钊在军法会审判庭上“态度甚从容，毫不惊慌”。4 月 28 日,李大钊等 20 人被判绞刑。李大钊“首登刑台”,“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李大钊青少年时代连续接受了 10 年传统教育和 10 年近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教育。屈原、陆游、朱舜水等人的爱国精神，荆轲、高渐离的侠义风骨，李贽的反专制精神，道家的辩证思想，先秦儒家的爱民、保民思想、中和思想及孟子的心性论,《周易》中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变易观念，宋儒的理学，王阳明的心学，左丘明、司马迁的见识，唐宋古文家的文章等都对他产生了影响。这些影响对于他来说不是因循式的，而是与近代西方思想家，如卢梭、约翰·密尔、柏格森、爱默生,以及托尔斯泰、安部矶雄、河上肇、欧文、马克思等人的思想相交融，又在社会思潮的激荡中，在对同时代进步知识分子思想观念的吸收中，在对社会政治斗争和社会改造方向的反复思索中起作用的。

从五四新文化和五四政治示威运动这两个特定的

历史事件与李大钊的关系来看，李大钊作为进步启蒙思想家中的一员，有其不尽同于他人的思想特征，因而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早在民国初年，李大钊就产生了以改造人心为改造社会前提的意识，呼吁效法古今中外爱世文豪，“大声疾呼，以唤醒众生于罪恶迷梦之中”。1915 年《新青年》创刊之后，他立刻为陈独秀、高一涵等的启蒙文章所吸引,很快写出《青春》一文,寄往《新青年》发表。在那里，他提出宇宙是整体生命无限和个体生命有限的统一；有限的生命由生到死，由死到生的无限轮回构成宇宙无限的生命和无尽的青春；人的知、情、意结合而成的再造精神、再造能力可以使个人、人类、地球永葆青春,可以再造衰落、毁灭的民族、国家,使其再生。号召青年自觉肩负再造青春国家的重任，摆脱“黄金权力一切烦扰苦恼机械生活”之累，“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这样，他就从宇宙观、历史观、人生观相结合的广度，深化了陈独秀启发青年的话题。同时，他又做《民彝与政治》一文,将‘彝’释为‘器’、‘常’、‘法’,说明‘民彝’即民众日常生活中养成的习性、本能、智慧、品德及其持守的心理、愿望、意志、价值观念在国家政治中有着重要地位，是政治的源泉，应当在政治上得到充分体现；指出思想的政治应当是“唯民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即‘国法与民彝间之联络愈益疏通之政治’,挖掘了造成中国数千年专制恶政，阻碍“民彝”体现于政治的四个原因：历史积重之难返,依赖根性之难除,众

论武断之难抗，法制拘执之难移”；号召人们认识民彝可以创造历史，不要让古之圣经贤传牵着鼻子走；英雄伟人是受群众驱策的，不必迷信他们；要坚持言论自由;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来自‘民彝’之‘理’应当不断使“法”有新的内容……由此，以他深厚的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理论根底,在社会、政治、法律、心理等诸多层面构筑了有人民民主特色的“民彝政治”理论体系，丰富了初期新文化运动民主政治思想启蒙的内容。随后,他在短期担任《晨钟》报主编的日子里,宣传‘青春中华’主张,介绍托尔斯泰、尼采、培根等,试图将该报办成一份启蒙刊物。当陈独秀由讨论伦理觉悟，进而对康有为提出的要在宪法中保留‘孔教’与‘拜圣’之礼进行批驳之时，李大钊发表了数篇文章，尖锐地指出：孔子是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是国民中一部分孔子之徒的‘圣人’,而孔子之道是‘含混无界之辞”，因此绝无入宪理由，从而有力支持了陈独秀的观点。

与陈独秀等不同的是，在新思想与旧思想之间和东西方文化之间，李大钊持一种独特的调和观点。他的调和观大体可分四个层次：其一，就一般的意义来说，调和为美，调和为解决生活中矛盾的理想办法，调和产生的是不同于对立双方的第三种境界。其二，这样说来，社会生活中存在的新观念与旧观念，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就不是应该存一方去一方的问题，而应当把它们视为人类生活进步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使二者调和产生第三种境界的问题。其三，但是，真正的调和不是无立场地摇摆于新旧、东西之间，而是选择一种立场，在保存自己独立地位的同时，容忍对方。保存自己独立的地位就是坚持和积极宣传自己的主张，既容

忍对方以至吸收对方正确的东西，又要使对方接受自己的主张。其四，至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他是站在新的、进步的一方。这样，在新旧之争中，他是站在新派一边；在东西文化之争中，他最初是表现出有保留地赞扬西方“动”的文明，进而他认定俄罗斯文明可以为调和东西两种文化的媒介。这样，俄国革命无论从其“新”的意义，还是从其作为调和者之“第三”境界的意义，都很快吸引了李大钊。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李大钊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 的胜利》、《新纪元》等文，既给予了利用“协约国战胜”来标榜自己的北洋军阀祺棋瑞以严厉抨击，又为国人展示了一种新的社会改造方法和一种对世界未来发展新方向的认识。

从俄国革命中李大钊关注到三个问题：一是劳农翻身，无产者解放。他认为真正的平民大众的平等自由人道社会才是合理的社会，俄国已经做出了榜样。因此，他连续发表有关劳动阶级妇女的解放、劳动教育、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等问题的文章，宣传“现代民主主义”是与这些问题相关的“社会民主主义”。二是他认为俄国革命肇始于最初俄国“许多文人志士”“跑到乡下的农村里去，宣传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道理”，因此号召知识分子与农工打成一气，青年人到农村去，到黑暗中去，变黑暗为光明，将农村建成民主的基地。三是他了解到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政党遵奉的是马克思主义，从而开始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此外，他还和同时代许多知识分子一道，积极宣传了民族自决的观念。

在这一时期，李大钊由于作为图书馆主任，有较多机会接触学生，他作为《新潮》社的顾问，为《新潮》、《国

民》等进步社团杂志写文章,他又和陈独秀合办关注社会政治问题的《每周评论》及他接连发表不同凡响的政治见解，他已经在青年学生中扩大影响。这种影响与同一时期北京大学进行的一系列有利于活跃学生思想的改革对学生的影响是一致的，因而对五四政治示威运动中有大批学生投入斗争发生了间接的推动作用。而在示威运动期间，李大钊参与编辑的《每周评论》的积极介入，则对学生群众起到直接鼓舞乃至指导作用。

然而,李大钊既没有像高一涵那样,接连撰写有关巴黎和会、青岛问题交涉、学生事件和国家法律问题等文章，也没有像陈独秀那样，书写和前往散发鼓动群众的《北京市民宣言》,而是同北京大学多数教职员一样,对运动保持了冷静的同情态度。他在运动期间发表的两篇重要文章,一是《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指出‘我们反对欧洲分赃会议所规定对于山东的办法，并不是本着狭隘的爱国心，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告诫人们要认清‘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世界”,应当树立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否则“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也还是没有效果”。这可以说是在高远的着眼点上为参加运动的学生青年提示思想方向。二是《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针对警察厅查封和监督报刊，日本公使公然向中国政府发出干涉言论自由的照会等事，批评政府限制言论自由的愚昧，论证了言论自由可以帮助人们发现真理,有益于人生、社会的道理。

李大钊之所以对示威运动表现出较为冷静的态度，在于他对运动可能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有所担心。他曾反复告诉人们，五四运动不止是一场爱国运动,更是人类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应当在改造世界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意义上来认识它。这同他将俄国革命开创的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认作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是“人道的警钟”;“自由的曙光”的认识,以及他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相关联。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帮助《晨报》副刊开辟了一个“马克思研究”专栏,并且准备将其轮值编辑的《新青年》6卷5号编成“马克思研究号”。他以日本学者河上肇连载于其本人于1919年1月创办的日文杂志《社会问题研究》月刊1—3号上的文章《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主,参考其它材料,开始撰写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该文在1919年9月和11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6卷第5、6两号连载发表。在这篇两万六千余字的长文中,李大钊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重点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对一些非难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了辩解。同时,他也按照自己长期坚持的注重人心改造、伦理改造、人道主义的思路,提出了应重视精神改造与物质改造并行的看法。他解释说,马克思将人类历史分为“前史”和“真正历史”两个阶段;“前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真正历史”是“互助”的历史。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确没有对“人类的前史”时期伦理道德的提倡给予足够重视,因此他提出在由人类的前史向真正的历史过渡期间应该加倍努力于“伦理的感化”和“人道的运动”。

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反映出他在接受这一理论过程中的理性思考。五四运动后“社会改造”呼声大起。李大钊确认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俄国的体现布尔什维主义应当是中国进行社会改造所应奉行的“主义”——在随后与胡适之间进行的问题与主义的讨论

中，李大钊坚持了这一看法。不久后，他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分析了社会历史进程中道德变动与物质变动的关系和解释了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并且撰写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阐述唯物主义在现代史学和社会学上价值的文章。他又在北京大学指导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参加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开设了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课程和多次进行同类题目的讲演。他的这些工作在引进、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是同一时期其他人无法相比的。新文化运动在五四政治运动之后增添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这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国社会产生了导致划时代转变的最初契机……这一切都与李大钊分不开。

文　　豪

洒一滴墨,使天地改观,山河易色者,文豪之本领也。盖文之人人者深，而人之读其文者，展卷吟哦，辄神凝目炫于其文境。潜移默化，观感旋殊，虽旷世异域，有千秋万里之遥，而如置身其间，俨然其时其境也者。文字感化之伟，充其量可以化魔于道，化俗于雅，化厉于和，化凄切为幽闲，化狞恶为壮伟。三寸毛锥力，能造光明世界于人生阨运之中。则夫文豪者，诚人类之福星也矣。

长天一碧,万木葱森,人影在山,樵歌山谷,科学家视之，僵石枯木之类耳；而一经文豪之点缀，则觉清风习习,透人肌骨焉。枫叶萧萧,江滨渔火,钟声夜半,月落乌啼，科学家视之，声光变动之象耳；而一经文豪之绚绘，则幽深潇洒，万念俱息焉。尽文豪之眼界灵机，悠悠宇宙之间，形色万殊，无不可为发舒性灵，感触兴趣之资。造物者降生万物，而不能使其所生之物，各自直觉其生机之大本，局部自限，缺陷靡穷；文豪本其直觉,发为文章,俾人天物我之实相,稍能映露万一,以通消息于其间，而补造物者之缺陷，斯其有功于造物者不小也。

嗟嗟 古今文豪,其身世何多在怨悲凄苦、飘零沦落之中也。征之东西，如出一辙。文王囹居羑里，寂寞铁窗,乃演《周易》。左邱失明,乃传《春秋》。屈灵均忠爱缠绵,而蔽伤于谗,憔悴行吟,卒沈湘水,而《离骚》、

《楚辞》,诗亡而后,此其继音。马迁身被宫刑,填胸愤慨,《史记》之作,模式来兹。乃至少陵忧国,血泪挥干。白也无家，佯狂弃世。放翁有种族之痛，渔洋有故国之思。他如金圣叹、李温陵之流,千古奇才,竟罹惨祸,杀其身而不足，更毁其书。中土文豪，大抵有身世悲凉，家国陵夷之痛者。而环稽西乘，唐德系出名族，中年飘泊，流寓天涯，神曲之作，为意大利文学之警钟。傑尔邦德士少年投笔,荷戈从军,雷邦特之战,伤中左腕,展转归途,虏于海寇,五载穷岛,因苦作奴,僧侣救之,始返故国，潜心著作，致西班牙文学得济于英、德之林。汉伯德曼目击社会，悲惨痛心，阶级制度之不良，发愤著书，有十九世纪沙翁之目。伊普逊以贫商之子，生于北欧,寂寞荒寒,贫且不能自给,童年供使,药屋愉闲,辄事文学,大学卒业后,伤祖国文学之不振,闭户著书,对兹缺陷社会，不惮口诛笔伐，文章声价，重于全欧。士多林贝尔西幼时,无力求学,艰苦卓绝,著书自活,为文伤时厌世，颇极深酷凄切之致，瑞典奄无生气之文学，至是始有新机。托尔斯泰生暴俄专制之下，扬博爱赤帜,为真理人道与百万貔貅、巨家阀阅、教魔、权威相搏战,宣告破门,杀身之祸,几于不免,而百折不挠,著书益力,充栋汗牛,风行一世。高尔基身自髫龄,备历惨苦,故其文沈痛,写社会下层之黑暗,几于声泪俱下。凡此者类皆艰苦备尝，而巨帙宏篇，独能照耀千古者也；是岂文章憎命，才华有以使之然欤？抑遭时不遇，荡析流离，余兹历刼之身，乃得优游以事文学，故其言之深长足以动人欤？嗟嗟 !江山故宅,文藻空存,册籍千秋，声华不朽。吾侪生兹末世，不见古人之面影，不闻古人之欬声,徒对陈编,怅维遗迹,叹文豪之遭遇,不禁掩卷失声也矣。而于彼古人，虽躯尽骨灰，一点灵

光，尚能岿然与天地终古，亦安庸吾辈之歔欷慨感为者！文豪之幸不幸，夫岂在瞬息百年之遭遇也哉！

吾尝论文豪与世运之关系,其见重于社会,不在盛世,而在衰世。盖当承平之世,物阜民康,群德日进,饮食各适其宜，作息各得其所，凡属圆颅方趾之伦，均得优游歌舞于熙皞和乐之天，击壤鼓腹之歌，曲巷流俗之谚,何莫非盛世元音,粉饰泰平,文章祝颂,岂必俟夫文豪者。若夫世衰道微，国风不作，举世滔滔，相率而趋于罪恶之途,百物丧尽,民不聊生,天地有晦冥之象,群象无生人之趣，倘无文豪者应运而出，奋生花之笔，歌离黍之章，则蚩蚩者不平之诉，呼吁何从，而精神上乏优美高尚之感化，忏悔之念，亦无自而发。人心来复之机既塞，惟日与禽兽暴惊强夺，相残杀以自活，其类将绝灭于天地之间也久矣。文豪之于衰世也，顾不重哉！顾不重哉！

抑吾闻之,千古之文章,千古文人之血泪也。盖欢愉之词难工，而愁苦之音易好。昔人尝有“诗以穷而益工”之语矣。夫喜怒哀乐，同为心理之变象，胡以一时感性之殊，发为文章，遂有声韵工拙之别。盖尝考之，其因缘有二：一世界观，一同情心也。吾人幻身于兹，假现世界，形躯虽间物我，精神则源于一。故优美高尚之文章，每为世人所同好。作者执笔之际，愁思郁结，哀感万端，悄然有厌卷浊世之思，精神之所倾注，恍然若见。彼真实世界之光影，不自知其流露于声气之间。人天物我，息息相见以神，故能得宇宙之真趣，而令读之者，有优美之感。若彼欢愉之词，大抵囿于兹世，纷纭人事，幻妄尘缘，乌从窥宇宙之美，又乌能深动乎人者，此愁苦之辞易动世界观者一也。人之生也，一切苦恼,环集厥躬,匆匆百年,黄粱梦冷,无强弱,无智愚,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